

面对新时代强劲的脉动、纷繁的事象、多彩的故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以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小 说、散文作品为例，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探索方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丰富的时代信息、动人的现实风景，更可以看到作家们不断拓展对现实观察和理解的半径、不断向时代的纵深处与隐蔽处求索的努力。这份回应时代、书写现实的冲动和野心，也许是带领文学走向广阔和多样的一条必经之路。

在大地上行走

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质地。一次偶然的机 会，回族作家阿慧了解到河南拾棉女工在新疆异地打工的故事，她不远万里来到北疆农六师南湖农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同女工们同吃同住同摘棉的生活。6万字的笔记，300多张图片，40多个拾棉女工的人生故事，最后凝练成了两万字的纪实作品《大地的云 朵》。这篇作品让人们感受到女工们扑面而来的欢声笑语，触摸到她们默默流下的泪水，看到她们坚韧、乐观、善良与勇敢的面庞。“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只要手脚不歇，俺孩儿就有活命。”为了给捡来的孩子治病，拾棉工“憨女子”在黑透的夜里还坚守在棉田，这份爱意和坚韧给人以原初的感动。

瑶族作家纪尘也是一位带着爱与悲悯在人间行走的作家。多年来，她的足迹已经遍及五湖四海，对异域的书写从过客式的猎奇不断走向深入。散文《冬天，在百万人的村庄》描写的是她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段感受，从那里冬天的寒冷和疏离写起，最后以温暖、包容和爱作结。在不同的土地上看别人、看自己，这是行走给予我们的独特视角。蒙古族作家金地的小 说《本纳比—素里卡车学校》、满族作家周子湘的小 说《慢船去香港》等，在描写文化焦虑之外，多了一层对生存的忧虑。两位作者都曾在早年有过离开熟悉的土地，到陌生文化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离开——归来”的人生轨迹作为作品增添了厚度。

回族作家马慧娟靠着在田间地头干活的间隙，把一个一个字敲进手机，写出40余万字的散文。在《雨在天堂》中，她以质朴干净的笔触默默记录着那些在干旱贫瘠的生活中挣扎跋涉的灵魂。她还还原了人们对于写作的最初想象，一边劳作，一边书写，同是耕耘，同有收获，汗也洒得，泪也洒得。《雨在天堂》更像是一块璞玉，虽然还欠打磨，却难掩生活的灼目本色。

异地求学的生活经历、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为“90后”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作品并未拘囿于自我成长体验的挖掘，越来越多的青年作者匍匐于大地之上，聆听来自故土、来自他乡的多元声音。回族作家宋阿曼的小 说《贤良》聚焦矿工生活，三个看似普通的主人公背负着重重的过往，他们曾经的人生故事暗示着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隐痛与暗疾，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需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种种命题做出艰难的回 应。东乡族作家丁颜的《蓬灰》也同样关注着人的精神处境。做正宗的兰州拉面，必须往里面放一点蓬灰，对于在深圳漂泊的索菲亚和拉面师傅哈伦来说，维护他们高洁精神的蓬灰是什么呢？苗族作家树弦的小 说



对现实生活的多维度观察

——2017年《民族文学》小说、散文阅读札记 □孙 卓

的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中农民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渴望，“祖祖辈辈都啃泥巴，出息不到哪去，你们给我长点志气，读出个样子来。”主人公内雅对孩子们说的话质朴而深刻。扶贫先扶智，良好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手段。

对农民命运和农村发展道路的探寻一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焦点。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 说《望云岭》、杨芳兰的小 说《跃龙门》等作品都对进城打工农民的精神生活报以关切的目光。而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 说《花娅人家》、土家族作家陈刚的小 说《余温》等作品则指向了“归来”的主题。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对乡村自然资源的重新体认都为“归来”提供了支持。越来越多的作品撕开了乡村田园牧歌的面纱，直面现实的困境，但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温暖和谐的乡邻关系，仍给回来的人们带来慰藉和希望。

满族作家刘荣书的小 说《纪念碑》也是一篇直面复杂世相的作品。纪念碑承载着英雄的事迹，代表着过去的荣光。但围绕着纪念碑的竖立，利益的纠葛、人性的幽暗已经与神圣的内涵渐行渐远。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那份真诚的想念与敬意却依然闪烁，令看到的人五味杂陈。与之相比，瑶族作家光磊的小 说《重返梅山》的主题更加明晰尖锐，作品用一个颇有荒诞色彩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何破解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难？要求违背生态规律重新开矿的恰恰是受环境污染毒害最深的梅山人，这一颇富张力的情节给人以震撼的警示，环保问题的复杂性 与艰巨性可想而知。

以散文见长的满族作家格致在小说《虎啸图》中继续了自己由个人经验推及公共经验的探索，当一个小科员的体重、头发、胡子都受到严格限制时，这一机关单位的工作怎会有创新和活

力？全篇似乎都笼罩在《虎啸图》中那张着大口的老虎的俯瞰下，令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权力和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格致以小见大地进行了耐人寻味的追问。对社会乱象的反思也催生了很多颇具讽刺意味的小 说。谁是活得长久的精明之人呢？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小 说《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以一个一波三折的小故事巧妙地做出了自己的回 答。藏族作家德本加的小 说《老狗醉了》同样具有一定的幽默感，作品围绕一条老狗的去留，以略显夸张的讽刺笔法，着意刻画了一位小学校长的官僚形象，藏文化独有的宽容特质令人在受到启迪和警示的同时，不忘报以会心一笑。相较之下，蒙古族作家季华的小 说《灰腾锡利》更具灰暗底色。主人公虽一心为民，但却因屡屡被人算计，而难以升迁。这块贫寒之地还留得住这位质朴的基层官员吗，小说戛然而止，令人怅惘。

旧瓶中的新酒

新时代不仅拓展了经验的边界，也为永恒性的文学话题开掘了新的思考路径。面对幽深处的精神现象，作家们以清醒的问题意识、敏感的时代眼光、独特的文化资源，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在旧话题中加入了新理解。

时间具有消弭一切的力量吗？在仡佬族作家王华的小 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中，已经认不得儿孙的老人陈泊水，仍然记得自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犯下的罪恶。受害者的谅解、时间漫漫的侵蚀，都没有办法褪去这份愧疚与痛楚，反而愈久弥深。没有人能阻挡那个在漫天风雪中蹒跚走向派出所求刑的蹒跚背影，它背负的是一个

人应有的担当，是人类向善向好的可能。侗族作家木兰小 说《白光照灼》中的女主人公郭小惠，同样为了寻求灵魂的安宁，放弃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

藏族作家尹向东的小 说《猎手》描写了一个受害者的自我救赎。它们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向纵深挖掘了人性的复杂幽暗与温暖柔软。背负着为死去父亲复仇这一重担的刀登，克服重重险阻，终于来到仇人面前，却发现真正的仇人早已死于另一场仇杀中。但故事并没有止步于此，失去复仇对象的刀登想杀掉仇人身边的一条老狗来发泄内心的仇怨，却发现自己从没有真正把刀刺进任何生命的身體中，从始至终，爱与悲悯一直潜藏于他的心中。

象征与隐喻也为主题的开掘提供了新的通道。壮族作家陶丽群的《打开一扇窗子》、壮族作家梁志玲的《噪音》等作品都是描写了一个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前者借“开窗”这一富有意味的核心意象，讲述了一个沉陷在隔阂与冷漠之中30年之久的亲情故事。开窗既意味着对临死之人的告别，也代表着对母亲、对自己的宽宥与谅解。后者将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隔膜、伤害与牵绊归之为“噪音”，这常常令人心烦意乱的声音是真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漫漫人生路的慰藉和陪伴。这份成长的隐痛也在朝鲜族作家许连顺的《女儿六岁初长成》、畲族作家朝颜的《逃离》等作品中浮浮沉沉，以不同的面向给人以柔软的触 碰。

文学以艺术的手法反映现实，成为关于这个世界的神秘谜语。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小 说《口信像古歌流传》、侗族作家潘年英的小 说《哭嫁歌》、土家族作家温新阶的散文《一棵树》、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土离我们有多远》、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这些古松该如何生活》《寻找茫茫黑海里的金钥匙》、藏族作家雍措的散文《月亮村的记忆》《凹村纪实》、侗族作家龙章辉的散文《进山遇到神》、土家族作家凌春杰的散文《茶润大地》、土家族作家田芳妮的散文《冷冲的风》、苗族作家句芒云路的散文《在苗苗的大地上》等颇具神秘文化色彩的作品也是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独特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一直是多民族文学的宝贵富矿。它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与经典的文学母题碰撞交融，往往会擦出耀眼的火花。以第代着冬的小 说《口信像古歌流传》为例，大爷、保长、爷爷之间略显俗套的故事只是一个容器，真正的华彩在弥漫其间 的口信和古歌，在时代和命运的操控下，个体的生命脆弱易逝，但言与声所指向的时间之外的虚无之境却散发着永恒的魅力。文化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连通了传统与现代、世道和人心。

因为篇幅所限，很多优秀的作品没来得及点评，很多作品在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精进和开拓也没有足够的空间阐释。“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新时代赋予文学以新使命，也馈赠其以新机遇。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们拥抱丰富经验、反映时代风貌的创作态势，这份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一年会有更多与时代同行的精品力作涌现。

穿过圩场的沉默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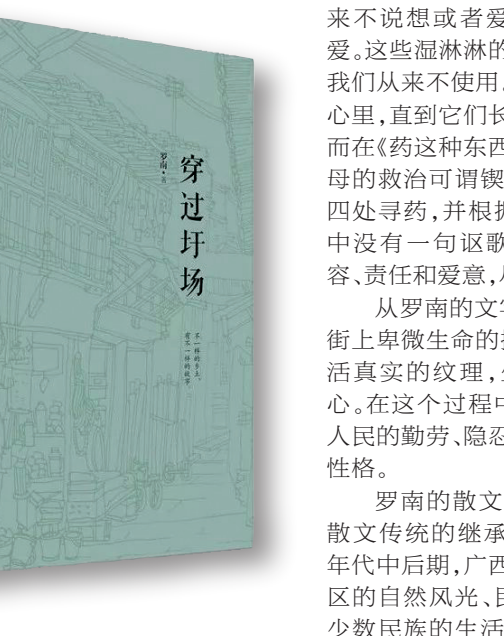
——评壮族作家罗南散文集《穿过圩场》 □韦 露

在广西以民族文化和乡土题材的书写见长的散文作家中，壮族女作家罗南无疑是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一位。翻开其最新散文集《穿过圩场》，我发现有一半的作品曾在《广西文学》上发表过。作为《广西文学》的编辑，我很荣幸能够见证她这十几年来，有了一条行程，看到她寻梦、摸索、成长的每一步。阅读这本散文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穿过圩场》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地域的力量是神奇而博大的，它不仅滋养了一个作家的身体，更滋养了一个作家的灵魂，它既是生命的土壤，也是精神的疆场。罗南笔下经常写到“山逛街”，丫字形的山逛街是一个地域符号，也是一个乡情符号，体现出作家思乡恋土的情结。在山逛街上，“街头街尾、家家户户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像一棵错节盘根的老树结出的果”，穿过圩场，那些人物和故事会从时光深处窜出来。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的地域色彩、民俗特征，越来越显得可贵。罗南无疑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版图，有了这块版图，一个作家就有了创作的沃野和富矿。而在这块版图上，覆盖的是亘古不变的“乡愁”，彰显着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

《穿过圩场》体现了鲜明的乡土人伦和民族特性。罗南擅于深入到乡村生活的内部，聚焦乡村生活的原生态，反映乡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乡土人伦和民族特性在其笔下得到充分的凸显，在《脚脚印串起来的街道》里，婆大跟姨婆争斗了半个世纪，不屈不挠，但她们却是用这种骂街的方式，惺惺相惜，互相取暖，互相支撑着一起活下去。《豁口》围绕父亲的离世展开记忆的挖掘。在父亲逝世之



前，“我”依次失去了祖母、六堂哥、小叔叔、四伯、姑妈，只是那个时候，岁月还没有成长到让“我”认识悲伤。父亲的离开对于“我”来说，就好像磕开了一道豁口，让“我”蓦然看到时间的黑洞，第一次品尝到悲伤的味道。“我”才逐渐领会死亡的真正含义，逐渐成长为像母亲、大姐那样坚强的壮族女子。

尼采曾说：“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罗南散文中诸多隐忍的痛感，无需更多的言说，但直抵我们的内心。在《水之上》中，库淹区的百乐街人起初排挤搬迁，后来慢慢适应，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扎根、发芽，开枝散叶，安身立命。

在罗南的散文中，没有太多温情脉脉的表达，情感都隐忍在心里、在细节中。正如《豁口》中所说，“父亲从

来不说想或者爱。我们都不说想或爱。这些湿淋淋的柔软温暖的字眼儿我们从来不使用。我们把它们深埋在心里，直到它们长成岁月的一部分。”而在《药这种东西》中，四伯父对四伯母的救治可谓锲而不舍，四处拜师，四处寻药，并根据药性自己配方，文中没有一句讴歌和赞美，但那份包容、责任和爱意，尽在不言中。

从罗南的文字里，我们看到山逛街上卑微生命的挣扎，坦荡着乡村生活真实的纹理，生存的艰难直抵人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壮族人民的勤劳、隐忍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

罗南的散文创作体现着对广西散文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西散文以描写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反映广西少数民族的生活为主；进入本世纪，作家们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罗南的散文同样体现了这两种倾向，既有浓郁的山野气息、浓厚的乡土情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又体现出开阔的视野、现代的意识，对人情伦理有深刻的洞察，于细微之中见深厚，于柔软之中见通达。期待罗南能够以更鲜明的现代意识、更宽广的视野、更多样的表现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挖掘复杂人性。

这个时代给作家们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写作素材，也考验着作家的思想力和洞察力。期望罗南的散文有更鲜明的个人风格，并寻求艺术的创新和突破，寻求本土文学传统与外来经验的有效结合，寻求时代精神与个人体验的深度融合，汲取更多的艺术营养，变得更加灵动、深邃。这需要她不断沉潜和蜕变，朝着光的方向努力奔跑，到达更远的远方。

农村学子的奋斗与追问

——读吕翼长篇小 说《寒门》

□张永权



个大包袱，直到最后才解开悬念。冯春雨考上大学后，就再也没和家中联系，她的人生命运走向，自然也是读者关心的。小说就在这个又一个的悬念中，吸引读者把它读完。

这部作品在大事中套小故事，使情节丰满多姿。同时，看似一些平凡的故事，也具有传奇的色彩。在冯维聪制造的各种机器人中，还造了一个为冯天俊代考的机器人，充满了传奇魔幻的色彩。但这一切都是和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使小说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小说的生活细节也很有张力，富有象征意义。例如，碓房村的碓窝，虽原始，却是这乌蒙深山小村生态文明的象征。作品在开头就专门写到它，在描写冯天俊、冯维聪上学春谷卖米交学费时又多次写到它。最后，当冯春雨带着她的法国老公贝克哈姆回乡，准备投资种植生态稻米时，让他感兴趣的就在这里家家户户的碓窝。这碓窝自然也成了离开故乡的人的乡愁寄托。还有村里那棵老白杨树，冯天俊的兄弟姐妹在树身上刻的印痕，成为他们人生命运的记录。每一道印痕，都记录着他们的人生故事。例如冯天俊从高考起，每考一次就往上边刻一道印，15道印痕不知记录了他多少人生的酸甜苦辣。还有冯氏兄弟亲手雕刻的孔子像以及每次考前的敬拜等，其蕴涵的思想情感，也颇让人品味。